
新中國南明史研究學術綜述*

謝貴安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新中國南明史研究承民國之基礎，曲折地向前發展，從低潮到高潮，經歷過建國至文革、改革開放至 20 世紀末、21 世紀三個階段，研究專著開始出現並增多，學術論文井噴式地湧現，研究範圍遍及南明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社會等各個方面，研究理論和方法不斷充實和改進。謝國楨、錢海岳、南炳文、顧誠等「南明通史」專家巍然屹立，後起之秀也相繼成熟和崛起。南明史教育日益繁榮，出現了一批批的碩士和博士論文，形成了後浪推前浪的局面。

關鍵詞：新中國 南明史 綜述 史學史

*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資助，項目名稱為「明清史學與近代學術轉型研究」，項目批准號為 16JJD770037。

「南明」概念最早出現在清康熙時陳鼎的《東林列傳》中，清中期錢綺撰《南明書》時一度使用，書既不傳，名亦湮滅。晚清時，革命黨借南明史事以排滿，「南明」概念得以啟動，南明史也因以復興。民國建立後，南明史有所消歇，因至抗戰軍興被再次啟動，成為中國人民抗擊日軍侵略的史學武器。朱希祖、柳亞子、謝國楨、翦伯贊和錢海岳等學者在民國的南明史研究中，堅持耕耘，奠定基礎。新中國成立後，南明史研究一度消沉，改革開放後，得到迅速發展。關於南明史研究的學術綜述，只有大陸學人高小娥、吳航對清代南明史研究作過梳理，¹韓燕飛對抗戰時南明史研究作了討論，²臺灣學人周安家和葉高樹對民國南明史研究作過梳理，³但尚未見專門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南明史研究的學術綜述問世。本人因撰此文，以寄拋磚引玉之望。

下面，根據新中國時期南明史研究的成果，梳理一下它的發展階段，並總結其特點。

一、第一階段：新中國南明史的初興

新中國南明史發展的第一階段，起於 1949 年建國，止於 1976 年文革結束，屬於新中國南明史研究的初興時期。這個階段的特點主要是那些從民國進入新中國的南明學者，在繼承民國南明史研究傳統的同時，將民國時南明史抗日救亡的主題，演變成歌頌明末農民起義的新主題。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新中國」）成立後，外敵摒退，國家統一，南明史研究的外在刺激消失，柳亞子倡導的南明史研究

-
- 1 高小娥：〈「往事南朝一夢中，興亡轉瞬鬥秋蟲」——有清一代南明研究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年）；吳航：〈百年來清代南明史撰述與研究的回顧〉，《中國史研究動態》2011 年第 1 期，頁 34-46。
 - 2 韓燕飛：〈抗戰時期的南明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0-11。
 - 3 葉高樹：〈南明史研究的回顧〉，《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臺灣國史館，1998 年）；周家安：〈南明史地位和研究意義〉，《明史研究專刊》1979 年第 2 期。

亦不再受到重視，加之政治思想運動一波一波興起，南明史的研究受到影響，仍在修改其《南明史》著作的錢海岳受到嚴重衝擊，南明史的研究轉而以農民戰爭史的面目出現，並得到快速發展，謝國楨《南明史略》（以及後來問世的顧誠《南明史》和南炳文《南明史》），都打上了農民戰爭的烙印，面貌為之一新。

歌頌農民起義與痛斥南明政府的腐敗是二位一體的工作。1943年畢業於華中美專的馬少僑（1920–2006），在新中國時擔任武岡師範學校教師，於1954年發表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南明史論文〈論南明永曆政府在武岡的潰敗〉，直接使用了民國時的「南明」概念，但在內容中，又稱南明為「殘明」，批評永曆帝是「逃跑主義」，對南明政權的腐朽和墮落作了揭露，同時稱尹子奇、袁有志是「農民起義軍」。⁴ 這篇文章反映了當時南明史研究中新舊過渡的特點。

1956年底成稿、1957年出版的《南明史略》，⁵ 是南明史出版的第一部專著。其作者謝國楨在民國時已是南明史的研究權威，經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改造，其《南明史略》以農民起義軍與南明聯合抗清為主線展開敘述，擺脫了民國時期以搜集南明史料和編纂南明史事為特徵的舊面貌。

《南明史略》出版後，引起了柳義南的關注。他在1958年發表〈評謝國楨著《南明史略》〉的書評，指出該書一反封建史家對本階級人物的抗清鬥爭寫得淋漓盡致，對農民軍的抗清鬥爭輕描淡寫的狀況，而對農民起義軍的抗清事業大書特書。⁶

1962年，方福仁延續南明史中重視農民軍的主題，對李錦和李過的關係進行了考證，明確指出李錦在李自成死後與高一功等將領一起「和南明政權聯合，進行抗清鬥爭」。⁷ 同時，朱永嘉的〈論南明抗清運動中各階段的動向〉，⁸ 吳乾就的〈論南明時的「聯明抗清」

4 馬少僑：〈論南明永曆政府在武岡的潰敗〉，《新史學通訊》1954年第12期，頁9–12。

5 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6 柳義南：〈評謝國楨著《南明史略》〉，《歷史研究》1958年第9期，頁56–62。

7 方福仁：〈李錦與李過——明季史料考辨一則〉，《江漢學報》1962年第6期，頁47。

8 朱永嘉：〈論南明抗清運動中各階段的動向〉，《新建設》1962年10月號。

鬥爭〉⁹等文，均繼續此前突出農民起義軍「聯合」南明、領導抗清的史學主題。此後，隨著政治運動的進一步深入，南明史的研究被「五朵金花」之一的「農民起義」議題所淹沒，終於偃旗息鼓。

除了讚頌農民軍在南明歷史上的主體地位外，當時的南明史研究中還出現了另一個主題，就是讚揚鄭成功統一臺灣。受此影響，1962年，謝國楨發表了〈有關鄭成功史乘輯錄〉¹⁰的史料文章。鄭成功擁護南明，統一臺灣，對於新中國「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政治形勢具有現實意義，自然成了謝氏的研究對象。

在政治風雲動盪的形勢下，老革命出身的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郭影秋，利用有利的資源，在南京大學組織了一批南明史專家，在艱難的環境下，繼續從事南明史研究，一度將錢海岳聘為兼職研究人員並講授南明史課程。他自己則從事李定國研究。1959年7月14日，時為南京大學校長的郭影秋給當時在上海任出版社副社長的陳向平寫信，敘述自己南明史研究的進展：「李定國稿，經校補，可得十五萬字，十七、八日可發出。惟因心情亂，序言尚未寫出，少緩即補寄。」¹¹1963年3月25日，出差北京的郭影秋在給陳向平的信中述說：「關於南明史資料的整理問題，我和中宣部理論處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表示支持。」¹²當他已接到調往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調令後，仍然心繫南明史料。1963年4月12日，在給時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副主任、副總編輯的陳向平的信中又說：「南明史料整理工作，照常做。我為李定國論文集寫了一篇代序。」¹³郭影秋還將政治上已被打倒的胡允恭調到身邊從事南明史教學和研究，使胡允恭得以完成《明末農民起義和抗清鬥爭史稿》一書及多篇論

9 吳乾就：〈論南明時的「聯明抗清」鬥爭〉，《學術研究》1962年第11期。

10 謝國楨：〈有關鄭成功史乘輯錄〉，《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2年第1期，頁176-197。

11 銅山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郭影秋談詩書簡〉，《銅山縣文史資料》第十七輯（銅山：銅山縣政協文史委員會，2007年），頁41。

12 同上注，頁69。

13 同上注，頁71。

文。¹⁴ 郭影秋本人則撰成《李定國紀年》一書。¹⁵ 顯然，在郭影秋領導的南京大學，其南明史的研究也以明末農民起義的面貌來展現。

但終因大氣候的限制，南明史研究在改革開放前，並未得到很大的發展。直到改革開放，學術活動才走上正軌，南明史研究得到恢復並逐步加速。

二、第二階段：新中國南明史的復興

新中國南明史研究的第二階段，起於改革開放，止於 20 世紀末，屬於新中國南明史研究的復興時期。在這一階段，幾部南明史專著問世，除了南炳文、顧誠的兩部《南明史》外，早已去世的柳亞子的遺著《南明史綱》，¹⁶ 也得以正式成書並出版，儘管其內容皆為民國時的舊作。此外，中國臺灣學者毛一波的《南明史談》¹⁷ 和美國學者司徒琳（Lynn A. Struve）的《南明史（1644–1662）》¹⁸ 也應運而生。與此同時，大量的學術論文得以發表，對南明的各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農民軍聯明抗清研究

改革開放後，南明史的研究開始復興，由於學術基礎和思維慣性的雙重影響，南明史的研究仍然是從明末農民起義軍聯明抗清領域徐徐展開。

14 《江蘇省高等學校教授錄》編委會編：《江蘇省高等學校教授錄》（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82。

15 郭影秋：《李定國紀年》（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16 柳亞子：《南明史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7 毛一波：《南明史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

18 Lynn A. Struve,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嚴壽澂校訂：《南明史——1644–1662》（海外中國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嚴壽澂校訂：《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嚴壽澂校訂：《南明史——1644–1662》（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先談專著。1992年出版的南炳文的《南明史》¹⁹和1997年出版的顧誠的《南明史》，²⁰均是用章節體撰寫的學術著作，屬於敘事和議論兼重的現代史書，在敘述中突出明末農民起義軍在南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時對南明政府的腐敗性進行揭露。這是自謝國楨《南明史略》以來撰寫南明史的一以貫之的學術路徑。眾所周知，專著出版晚，但寫作早，與論文的即時性有所不同。這兩部專著的史料儲備和學術觀點，都早於其出版年代。

再談論文。自1978年開始，重新關注南明時農民起義軍的聯明抗清活動的論文便不斷發表。洪煥椿發表了〈清初農民軍的聯明抗清問題〉（《歷史研究》1978年第5期）首開其端，接著林鐵鈞發表了〈清初的抗清鬥爭和農民軍的聯明抗清策略〉（《歷史研究》1978年第12期），李光中發表了〈關於清初農民軍的聯明抗清問題〉（《山東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6期），都集中在這一問題上進行研究。進入80年代，農民軍聯明抗清的研究成為熱點，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如李尚英、王政堯的〈論清初農民軍的「聯明抗清」〉（《學習與思考》1981年第1期）、史松的〈清初的社會矛盾和農民軍的「聯明抗清」〉（《歷史教學》1981年第6期）、覃延歡的〈略論清朝初期桂林的抗清鬥爭〉（《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許曉秋、尹承琳的〈大順、大西軍「聯明抗清」考〉（《遼寧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王勝國的〈明末農民軍「聯明抗清」新論〉（《松遼學刊》1988年第1期）、宋國強的〈論清初大西軍聯明抗清中孫李分歧〉（《錦州師院學報》1988年第2期）、李映發的〈孫可望與李定國〉（《貴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明末抗清鬥爭的失敗〉（《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禾水和小丁的〈大西軍在滇桂黔〉（分刊在《山茶》1988年第5期、第6期、1989年第2期）、顧峰的〈論大西軍與永曆朝的聯明抗清〉（《楚雄師專學報》1996年第1期）、尹承琳的〈試論李定國「聯明

19 南炳文：《南明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

20 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初版，2003年再版）；氏著：《南明史》（顧誠著作系列）（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

抗清」鬥爭失敗的原因〉（《雲南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滕新才的〈「夔東十三家」抗清史論〉（《四川三峽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李治亭和梁希哲的〈論南明與大順、大西軍餘部的抗清及其歷史命運〉（《第八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9年8月1日）、夏銘鎰的〈大順軍餘部聯明抗清史實考〉（同上）。此外，韓長耕和向祥海發表了〈李自成死地、終年問題考〉（《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1年第3期），認為李自成隱藏在湖南石門夾山寺做了和尚，暗中指揮農民軍聯明抗清。有的學者開始探討農民軍與南明政府的關係。謝源遠發表了〈夔東十三家及其與南明王國的聯繫〉（《江漢論壇》1980年第4期）。

稱頌農民軍抗清的同時，便是對南明政權的貶斥。如楊光歧的〈南明抗清失敗原因初探〉（《南都學壇》1983年第1期）指出：「南明完全承襲了亡明積弊，政治極端腐敗，不能推行切實可行的政策。這是它抗清失敗的政治原因。」²¹

還有學者對農民軍降清問題作了討論。如沈定平的〈洪承疇的招撫與孫可望的降清〉（《社會科學研究》1981年第3期）就是如此。這已有點主題變奏了。

（二）《桃花扇》及其對象、作者研究

改革開放之初，南明史的研究，從《桃花扇》開始著手。相比於農民戰爭的嚴肅，《桃花扇》的研究無疑具有輕鬆的特點。1978年，蕭善因發表了〈試論孔尚任的《桃花扇》〉一文²²。第二年，《電影評介》雜誌在李獨青〈觀電影桃花扇七絕三首〉旁邊，有一段補白〈《桃花扇》原作者簡介〉，介紹了侯方域的情況，說他「寫一部反映南明一代興亡的歷史戲」。²³進入80年代後，《桃花扇》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有戴勝蘭、梁國輔的〈談孔尚任《桃花扇》的思想傾向〉（《齊魯學刊》1981年第6期）、孟祥照的〈桃花扇底系南

21 楊光歧：〈南明抗清失敗原因初探〉，《南都學壇》1983年第1期，頁63。

22 蕭善因：〈試論孔尚任的《桃花扇》〉，《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4期，頁267-271。

23 《電影評介》1979年第21期，頁22。

朝——談《桃花扇》中的「扇」》（《河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倪復賢的〈孔尚任和他的《桃花扇》〉（《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4期）、馮維素的〈試談《桃花扇》的藝術成就〉（《淮陰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4期）、衛衛的〈歷史·剪裁·劇本——談孔尚任對歷史題材的藝術處理〉（《東嶽論叢》1985年第4期）、洪柏昭的〈《桃花扇》的思想評價問題〉（《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劉維俊發表〈桃花扇底送南朝——論《桃花扇》〉（《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2期）、潘京京的〈一部南明興亡錄——談談《桃花扇》的史學價值〉（《曲靖師專學報》1987年第1期）。進入90年代，《桃花扇》的研究仍然比較熱，有朱鴻和陳鴻儒的〈桃花扇底話興亡——孔尚任和他的《桃花扇》〉（《福州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張宇聲的〈吳梅村與卞玉京〉上下（《淄博學院學報》1999年第3、4期）等文。

《桃花扇》當然屬於南明文學。這一階段，南明文學的研究尚較薄弱，但對南明詩人的研究已經展開，如黃文寬的〈南明廣東詩說〉（《嶺南文史》1988年第1期）就是其一。

（三）對南明史料發掘並對史實進行考訂

1979年，王叔武發表〈南明史料朔閏考異——《行在陽秋》劄記〉（《思想戰線》1979年第3期）一文，對南明史料及其朔閏進行考訂。而對南明史料進行發掘的，主要是地下文物，如印璽、錢幣和碑誌等。關於印璽發現和介紹的文章有唐昌樸的〈南明政權的兩枚銅印〉（《江西歷史文物》1980年第2期）、羅雲的〈廣西玉林出土南明「平東將軍之印」〉（《文物》1981年第7期）、王其珍和潘言敏的〈貴州道真縣出土南明將軍印〉（《文物》1985年第8期）、林士民的〈浙江寧波出土明代銅印〉（《考古》1985年第10期）、朱瑞明的〈浙江嘉善出土一方南明官印〉（《文物》1990年第3期）、謝子熊的〈廣東肇慶發現南明官印〉（《文物》1991年第11期）、永祥的〈南明「總監五省中軍總兵關防」印及鄭逢元〉（《貴州文史

叢刊》1992年第4期)、曹錦炎和王小紅的〈南明官印集釋〉(《東南文化》1992年第Z1期)、周曰璉的〈四川蘆山縣博物館收集的唐和南明官印〉(《考古》1993年第8期)、于鳳芝的〈廣西出土九方南明「永曆」官印考〉(《文物》1998年第10期)、蕭明華的〈雲南昆明五華山出土明代官印〉(《文物》1999年第7期)、陳鋼的〈南明「提督川陝總兵關防」印及相關問題〉(《四川文物》1995年第5期)等,可謂碩果累累。關於錢幣的文章,有錢存浩的〈談遵義鑄的興朝通寶與永曆通寶〉(《中國錢幣》1985年第4期)、林兆育的〈鄭成功「永曆通寶」版別補充〉(《西安金融》1999年第2期)、貴港錢幣學會課題組的〈桂平南明錢監及鑄幣新探〉(《廣西金融研究》1999年第S1期)等。關於碑誌的有龍尚學和房健的〈安龍出土的南明永曆皇室墓誌銘〉(《貴州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李大光的〈貴州古跡明十八先生墓考〉(《貴州文史叢刊》1980年創刊號)、晨曲的〈《天生城碑記》辨〉(《四川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程存潔的〈記南明隆武政權時期的一件珍貴石碑〉(《廣東史志》1998年第4期)。此外,還有文章對發現的南明銀器、檔案作了介紹,如舒向今、曾志鴻、向開旺的〈湖南通道發現南明窖藏銀器〉(《文物》1984年第2期)、黃清和的〈安化縣檔案館徵集到明末清初五件珍貴歷史檔案〉(《湖南檔案》1991年第6期)、〈尹三聘與永曆皇帝最後的聖旨〉(《湖南檔案》1995年第5期)。還有學者對南明書信作了解讀,如鄭彥離的〈聲溫而氣壯——評史可法的《復多爾袞書》〉(《中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與此同時,學界還對南明史實進行辨析和考證,發表了多篇論文,如方福仁的〈後明韓主事質疑〉(《江漢論壇》1980年第4期)、秦暉的〈「後明韓主」烏有說〉(《陝西師大學報》1992年第1期)、朱仲玉的〈南明永曆朝禮兵二部尚書郭之奇死事辨正——兼論他的武略與文才〉(《廣西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等,主要集中在對南明「韓主」事實的質疑上面。

(四) 對南明史學展開研究

這一階段，南明史學史開始興起。1980年，袁英光發表了重要的論文〈夏燮與《明通鑒》研究〉，對夏燮突破清朝南明之大防，將南明史寫進明朝編年史中作了讚揚。²⁴此後，這一結論反覆為各種歷史辭典所應用。稍後，鍾揚發表了〈史識史才皆絕倫——論戴名世的史學成就〉（《安慶師院學報》1986年第3期），方祖猷發表了〈清初搜集南明文獻述略〉（《史學史研究》1990年第1期），但關於清代南明史學的研究還相當薄弱。

不過，學術界對民國時期乃至新中國的南明史學卻相當重視，發現了一系列研究論文，對民國學者的南明史研究成果進行了總結與表彰。

民國學者的南明史研究者，首先進入改革開放後史學眼簾的是柳亞子。1979年，「補白大王」鄭逸梅在〈柳亞子兩、三事〉（《學術月刊》1979年第4期）中，介紹了柳氏在民國時研究南明史的經歷。接著，謝國楨的〈愛國詩人柳亞子與南明史乘〉（《歷史教學問題》1981年第1期）、李耿、李建平的〈抗戰時期柳亞子在桂林的生活和創作〉（《廣西社會科學》1987年第2期）、王國平的〈柳亞子與南明史〉（《蘇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王晶焄的〈如何評價柳亞子〉（《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桂雲的〈以愛國精神治史修志的柳亞子〉（《南京史志》1995年第Z1期）、柳義南的〈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稿的失而復得記〉（《圖書館雜誌》1995年第3期）、史全生的〈關於柳亞子對南明史的研究〉（《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柳和城的〈柳亞子羿樓藏書失散之謎〉（《世紀》1999年第6期）等論文不斷問世。

翦伯贊作為民國時研究南明史的專家，第二個進入了改革開放後的史學眼簾。1981年，文革時含冤而死的翦伯贊1940年3月的舊作〈論南明第三個政府的鬥爭〉（《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3期）得以發表，該文敘述了南明永曆政權的抗清鬥爭。同期，張傳璽發表〈《論南明第三個政府的鬥爭》發表記〉解釋了翦作的寫作背景

24 袁英光：〈夏燮與《明通鑒》研究〉，《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頁157-172。

和發表過程。稍後，榮天琳發表〈論抗戰時期翦伯贊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貢獻〉（《北京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一文。

民國學者研究南明史之成就卓著者，還有謝國楨。改革開放後，也有學人對其南明史成就進行表彰。韋祖輝發表〈皓首盡瘁，史壇垂芳——謝國楨先生傳略〉（《明史研究》第二輯「紀念謝國楨先生九十誕辰專輯」，1992年）一文，提到他在南明史領域的成就。

新中國崛起的南明史家南炳文，其南明史成果最早出現在他與湯鋼合著的《明史》（下），增訂後又單獨出版。學者們對其南明史成就多有讚譽，如嚴敘的〈一部創始性與總結性相結合的學術著作——評《明史》下冊〉（《史學集刊》1992年第3期）、笑容的〈南明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水平——評南炳文《南明史》〉（《歷史教學》1993年第6期）、常可的〈總括集成，創出新意——簡評《南明史》〉（《天津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等文皆是如此。常文指出：「這是迄今為止以現代史觀全面評述南明歷史的第一部學術著作，該書顯示出十分鮮明的特色」。²⁵

繼南炳文之後，顧誠的《南明史》正式出版，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重視。陳梧桐隨即發表了〈一部將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準的佳作——評顧誠著《南明史》〉（《歷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對顧著作出了高度評價。此後，紀程的〈南明史研究的重大突破——顧誠《南明史》讀後〉（《史學集刊》1998年第1期）、何齡修的〈讀顧誠《南明史》〉（《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秋禾的〈名姓空掛南明史——顧誠《南明史》書後〉（《博覽群書》1998年第9期）、郭小凌的〈文章不寫一字空——評顧誠《南明史》的治史方法與治史精神〉（《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4期）、韋祖輝的〈考證嚴密 富有創見——評介《南明史》〉（《中國圖書評論》1999年第8期）等均給予高度評價。然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比如李治亭不贊成顧著將南明史的起始時間向前延伸到李自成進京的三月十九日，並將結束延後到康熙三年農民軍最後一個抗清

25 常可：〈總括集成，創出新意——簡評《南明史》〉，《天津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頁112。

基地被摧毀，認為南明史就是南明幾個政權的興亡史，不贊同顧著以農民軍與漢族各派及各民族抗清為主線來建構南明史體系。並對顧著中提出的清朝「民族征服論」、「竊取論」、「破壞論」、「打斷社會進程論」等觀點，逐一辨駁，認為對南明史的評價「應置於明亡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中加以考察」。²⁶

美國學者司徒琳《南明 1644-1662》一書出版後，劉剛直發表了〈美國出版《南明 1644-1662》一書〉（《國外社會科學》1985 年第 8 期）予以介紹，閻崇年、何平發表〈評司徒琳教授所著《南明史》〉（《北京社會科學》1996 年第 2 期）予以讚揚。

除了對南明史進行整體研究外，新中國還出現了對南明某一側面探討的著作。1996 年，張玉興的《南明諸帝》出版，²⁷ 李尚英發表〈獨闢蹊徑的南明史研究——《南明諸帝》評介〉（《清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書評，對張著作出了正面評價。此外，還有將南明史通俗化的作品問世。1985 年，胡山源等所撰《南明演義》出版。但該書自撰寫之初就官司纏繞。作為上海師範大學教授的胡山源，於 1955 年接受四聯書店約稿，著手撰寫《南明演義》，並於 1957 年底完成全書手稿，但因被劃為右派而不能發表。直到 1980 年下半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當時尚屬江蘇人民出版社）徵得胡山源的同意，決定將手稿大幅度修改後出版，江陰市文教局組織周良國、周信禮等人同改，一度惹出著作權之爭。1984 年 10 月，江蘇古籍出版社將上冊正式付印（版權頁上標的是 1985 年），次年 11 月，中冊也發稿付印。²⁸

（五）對南明人物研究加速

在南明史人物的研究中，鄭成功仍然是一個熱點。改革開放後，學術界發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論文，如楊光歧的〈論愛國主義者

26 李治亭：〈南明史辨——評《南明史》〉，《史學集刊》1999 年第 1 期，頁 49。

27 張玉興：《南明諸帝》（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年）。

28 參見王浣凡、侯鏡宙、趙建聰：〈審理《南明演義》著作權糾紛案始末〉，《人民司法》1988 年第 6 期。

鄭成功——紀念鄭成功逝世三百二十周年〉（《河南師大學報》1982年第3期）、盛仰紅的〈鄭成功給日本幕府的信〉（《史林》1987年第2期）、楊彥傑的〈鄭成功封爵新考〉（《福建論壇》1989年第1期）、林永銳的〈鄭成功三代人所走過的道路〉（《文史雜誌》1989年第4期）等。上述這些研究，均未在題目中標明鄭成功是南明大臣這一事實。1990年陳碧笙發表的〈鄭成功對清和議問題及其與明室的關係——鄭成功研究之二〉（《廈門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則直接指明了鄭成功為南明之臣的關係。

除了鄭成功外，學術界對南明人物的研究開拓了廣泛的空間，發表了一系列學術論文，有申之春的〈關於閩爾梅〉（《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2期）、蔡起的〈應該恢復史可法民族英雄的歷史地位——兼與章石承、秦子卿等同志商榷〉（《揚州師院學報》1980年第4期）、王綱的〈論孫可望〉（《貴州社會科學》1982年第1期）、洪煥椿的〈李定國簡論〉（《明史研究論叢》第二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徐和雍的〈關於張煌言的評價〉（《杭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劉乾的〈南明宰相李永茂及其著作〉（《文物》1984年第3期）、張新民的〈南明高僧月幢禪學思想初探〉（《古籍研究》1998年第3期）、王偉的〈黃道周斥洪承疇〉（《歷史教學》1990年第5期）、一丁的〈南明愛國使臣左懋第〉（《煙臺師範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丁鼎的〈寸丹冷魄銷難盡——南明殉國使臣左懋第〉（《文史雜誌》1997年第4期）、張澤夏的〈南明英烈何騰蛟〉（《貴州文史叢刊》1992年第2期）、劉秉錚的〈明末江南抗清義士夏之旭事蹟考辨〉（《貴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尹秀芝和王朝曄的〈試論焦璉在抗清鬥爭中的作用〉（《北方論叢》1995年第1期）等。對南明歷史人物的研究中，形成了一個重點，即對南明愛國詩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先後發表了周承珩的〈「垂節義於千齡」——讀張蒼水的晚期詩歌〉（《寧波師專學報》1981年第1期）、楊積慶的〈愛國詩人錢邦芑〉（《教學與進修》1984年第2期）、全建華的〈楊龍友詩歌的愛國思想初探〉（《貴陽師院學報》1982年第4期）、蔣星星的〈丹忱專在念時艱——讀船山詩零拾〉

（《船山學報》1988年第S1期）、陳慶元的〈南明金門詩人盧若騰〉（《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第4期）等文。

（六）對南明王朝本身開展研究

改革開放後，有學者開始跳出農民軍聯明抗清的窠臼，直接研究南明王朝本身。這大概是「新史學」運動以後，直接以皇朝為研究對象的特殊舉動，是對民國時柳亞子、錢海岳式以紀傳體撰寫南明史所反映的王朝歷史的一種回歸，也是思想解放的一種表現。劉毅的〈南明帝后事略〉（《紫禁城》1996年第1期）屬於綜合性的介紹。范沛濂的〈南明福王應立〉（《史學集刊》1991年第3期）、趙連穩的〈南明弘光政權速亡原因初探〉（《開封教育學院學報》1989年第3期）、陳麟德的〈「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小議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4期）則對福王弘光政權進行探討。黃君萍的〈評隆武帝〉（《廣東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戰繼發的〈論隆武帝〉（《學術交流》1993年第3期）對唐王隆武政權進行探討。其中張嗣介的〈略談明末清初江西最大的一次抗清戰爭〉（《江西歷史文物》1986年第S1期），講述了明末清初南明唐王政權的兵部尚書楊廷麟在贛南一帶領導的抗清鬥爭，是單獨敘述南明王朝抗清活動而沒有與農民軍聯繫起來研究的較早的論文。而研究最為密集的是南明永曆王朝，有龍尚學、房健的〈南明永曆王朝始末〉（《貴州文史叢刊》1981年第1期）、作喆的〈南明永曆朝皇太后、皇后與皇太子皈依天主教〉（《紫禁城》1985年第1期）、陳光崇的〈永曆八庶常事略〉（《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秦慰儉的〈南明永曆政權在廣西的五年〉（《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吳炳金的〈永曆皇帝的三江之行〉（《文史春秋》1995年第5期）、壯之的〈南明廣德公主落難廣西武鳴〉（《文史春秋》1996年第3期）、王守文的〈孫可望占據滇黔始末〉（《貴州文史叢刊》1993年第1期）、萬揆一的〈南明永曆時期「禦滇營」的覆滅〉（《雲南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還有將南明與清朝政策進行比較的論文，如南炳文、吳彥玲的〈清朝政

策比南明弘光政權的高明之處》(《歷史教學》1990年第10期)。探討南明失敗的原因並對南明腐敗進行聲討的論文，有何平的〈孫李交惡與西南抗清敗局的形成〉(《貴州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戰繼發和李敬晶的〈永曆帝與南明生機的淪喪〉(《大慶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李福君的〈腐敗的南明弘光政權〉(《歷史教學》1995年第1期)、黃君萍的〈廣州紹武政權的建立與南明政治的腐敗〉(《史學集刊》1996年第3期)。在剝離了與農民軍「聯合」抗清的主題後，翁潔在〈試論南明政權抗清的性質〉(《廣西右江民族師專學報》1997年第1期)一文中，直接稱南明諸政權抗清的目的是企圖復興腐敗的明朝，阻礙清代統一中國的步伐，與當時人民的抗清性質意義完全不同。

南明王朝的研究，較有創新的是對南明對外政策的探討，如馮佐哲的〈南明出使羅馬教廷的卜彌格〉(《紫禁城》1988年第4期)、戰繼發的〈隆武對外政策初探〉(《學習與探索》1988年第5期)等文。

(七) 開始關注少數民族在南明史的作用

這一階段，少數民族在南明史上所起的作用也得到了重視。如李增夫的〈西南少數民族在李定國抗清鬥爭中的貢獻〉(《貴州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黃義仁的〈從南明王朝播遷安龍到王囊仙起義後的布依族社會〉(《布依學研究之三——貴州省布依學會第二屆年會暨第三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1年6月30日)等文探討了西南少數民族，特別是布依族在南明史中的歷史作用。

三、第三階段：新世紀南明史研究的鼎盛

第三個階段起於2000年，迄於當下，屬於新中國南明史研究的全盛時期。

進入21世紀後，南明史研究迅猛發展，不僅內容廣泛，而且十分深入。在專著上，也有5部書問世，即已故學者錢海岳的遺著

《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劉中平的《弘光政權研究》（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年）、²⁹英年早逝的張暉的《帝國的流亡：南明詩歌與戰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敖運梅的《南明浙東遺民詩歌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³⁰和吳航的《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除了錢海岳的巨書（14冊）全面敘述南明史外，其他專著分別對南明史的不同時段和不同側面作了探討。錢海岳的《南明史》在民國時基本寫就，於新中國第一階段作了增補和修改，用紀傳體撰寫南明歷史，融鑄了大量的南明史料，其考證辨析之功甚偉。與此同時，南明史研究的論文數量則呈爆炸性增長，論題遍及南明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南明史教育和研究步入正規並迅速發展，出現了大量相關的博士和碩士論文。後者是這一階段南明史研究的顯著特點。

綜合這一時期的論文，可以發現南明史的研究有以下重點。

（一）對南明王朝本身展開研究

自改革開放開始直面南明王朝歷史，至21世紀時，南明王朝史研究更加繁榮。有對南明所處國際時局的研究，如李伯重的〈小問題，大歷史：全球史視野中的「永曆西狩」〉（《西北工業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對南明王朝的研究，從福王弘光政權、唐王隆武政權、魯王監國政權，到桂王永曆政權，都有學者進行專門的探討。

對弘光政權的研究，有張玉興的〈南明弘光帝「失德」駁議〉（《文化學刊》2008年第3期）、一得的〈弘光帝的名字怎麼寫〉（《咬文嚼字》2010年第1期）、張學良和趙睿才的〈明代文人遺民筆下的福王繼統之爭〉（《華夏文化論壇》2016年第2期）等。

29 南炳文曾撰：〈史鏡之作用——評《弘光政權研究》〉（《中國圖書評論》2009年第5期）進行評論。

30 有學者發表〈《南明浙東遺民詩歌研究》簡介〉（《寧波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一文，予以推介。

對隆武政權的研究，有龐亮的〈試析南明隆武帝繼統原因〉（《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年第9期）、孫祥寬的〈南明弘光政權始末〉（《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王歌鶯的〈明亡清興之際的南明皇帝——朱聿鍵〉（《南都學壇》2007年第6期）、陳支平的〈隆武帝及其再評價問題〉（《故宮學刊》2015年第2輯）、〈明末隆武帝及鄭芝龍遺事摭餘〉（《第十七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紀念明定陵發掘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2016年8月22日）等。

對永曆政權的研究，有趙仲英的〈南明永曆帝走騰越記事〉（《昆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2期）、王獻軍的〈南明桂王朱由榔肇慶即位時間考〉（《廣東史志》2001年第1期）、豆培康的〈永曆帝在雲南〉（《雲南日報》2006年3月30日）、歐巧玲的〈從《明季南略》看南明永曆政權在廣西的活動〉（《傳承》2011年第2期）、翁家烈的〈對南明永曆政權之考量〉（《貴州文史叢刊》2012年第4期）、孫翊華的〈永曆帝殉國與昆明金蟾寺軼事〉（《雲南日報》2013年10月27日）、薛冬平的〈南明弘光政權的生死時速〉（《文教資料》2016年第25期）、張宏傑的〈生為獵物：永曆〉（《當代》2012年第1期）、董姿君的〈永曆朝的安龍歲月〉（《文史天地》2017年第2期）、高鵬成的〈永曆帝：南明悲歌，落魄天子〉（《文史天地》2018年第253期）、張玉興的〈論南明皇帝及其時代〉（《明清論叢》2018年第1輯）、佚名的〈動搖南明小朝廷的「三謎案」〉（《文史月刊》2013年第12期）、韓繼偉的〈從亡國悲情視角看南明永曆王朝存在的三個時期〉（《雲南開放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等文。

對魯王監國政權，也有學者進行研究。如陳春聲的〈在禮法正統與政治現實之間——魯王在金門活動及相關歷史記憶的研究〉（《閩台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文。還有對南明兩個王朝之間的政爭進行研究的，如黃焱章的〈廣東南明永曆與紹武政權之爭〉（《貴州文史叢刊》2014年第4期；又載《嶺南文史》2014年第4期）。

還有學者對南明皇室進行研究。如何齡修的〈太子慈娘和北南

兩太子案——紀念孟森先生誕生 140 周年、逝世 70 周年〉（《中國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胡濤的〈史料齟齬背後的政治博弈——以明末太子案的歷史記載為例〉（《珞珈史苑》2015 年 4 月）、梁志勝和王浩遠的〈明末秦藩世系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0 年第 5 期）、徐梓又、王浩淼和王小豐的〈略論南明宗室封爵紊亂出現的原因〉（《湖南工程學院學報》2020 年第 2 期）等。

對南明王朝的研究，包括對其首都的研究，在這一階段有不少成果，如對弘光朝首都南京作討論的，有劉中平的〈明代兩京制度下的南京〉（《社會科學輯刊》2005 年第 3 期），對永曆朝早期首都肇慶討論的，有謝佐永、王獻軍的〈淺析南明永曆朝廷初設於肇慶之原因〉（《肇慶學院學報》2001 年第 3 期），對永曆中期首都安龍討論的，有劉剛的〈安龍：取意安頓「真龍天子」〉（《當代貴州》2005 年第 1 期）、范同壽的〈貴州唯一的封建王朝「皇都」〉（《當代貴州》2010 年 12 期）、王仲坤的〈永曆朝廷在安龍的政治文化活動述評〉（《興義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15 年第 6 期）、巴婁的〈南明行都古風猶存〉（《理論與當代》2011 年第 6 期）、岑侃、孟航宇和李旄的〈南明古都 荷香之城〉（《當代貴州》2012 年第 36 期）等。

這一時期的學者不僅研究南明的古都，還研究南明的陵墓，如岑沫的〈廣西梧州「南明興陵」迷蹤揭秘〉（《文史春秋》2016 年第 3 期）等。

南明王朝的研究，還包括該政權的活動範圍。如李箭的〈《明季南略》中有關南明政權在廣西活動史實之研究（出處見後）〉、范玉春的〈永曆政權時期廣西鄉紳的抗清鬥爭〉（《賀州學院學報》2016 年第 2 期）、沈一民的〈南明政權對山東地區的影響〉（《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何先龍的〈南明王朝在貴州有關重要史實考〉（《黔西南日報》2014 年 8 月 15 日）等。

南明王朝，當然包括其制度，對此有一些學者做過認真的研究。張金奎的〈南明隆武朝的錦衣衛〉（《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楊春君的〈南明鄉試考〉（《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胡凡的〈南明隆武朝開科取

士鉤沉〉(《遼寧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吳航的〈近四十年來明清易代之際科舉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4期)、趙現海的〈南明軍鎮「藩鎮化」現象及其歷史源流〉(《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何權潤的〈明末兩京制度諸弊端考〉(《大眾文藝》2017年第16期)等，分別對南明的錦衣衛、科舉、軍鎮藩鎮化、京城等制度和現象進行了探討。

對南明黨爭的研究，則有田波甫的〈明末清初話短長之四 縈繞不去的陰影——與國偕亡的南明「黨爭」〉(《深交所》2008年第1期)、臧守剛的〈侯方域罹南明黨人獄始末考〉(《漯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孫曉龍的〈南明黨爭述論〉(出處見後)等。

對南明王朝的政策、措施等進行的研究，成果也頗為可觀。有安尊華的〈試論孫可望治理西南地區的經濟政治措施〉(《開發中的崛起——紀念貴州建省590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集》，2004年6月30日)、盛衛國的〈明末滇派幣的歷史及其特點〉(《江蘇錢幣》2007年第4期)、劉中平的〈南明弘光政權與清朝幾種政策的比較研究〉(《遼寧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弘光政權內部黨爭對「四鎮」的影響〉(《第十四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7月15日)及〈清朝與南明弘光稅策的得失比較研究〉(《滿族研究》2011年第4期)、張金奎的〈弘光政權對清政策與山東的喪失〉(《明史研究》第九輯，2011年)、田冰的〈從大量追諡前朝官員看南明政權與反清復明的抗爭〉(《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羅燕的〈南明政權建設與抗清鬥爭研究〉(《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尹巧瑞的〈南明措餉問題探析〉(《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王榮滢的〈袁崇煥南明平反事蹟考〉(《嶺南文史》2017年第1期)、程楠的〈論南明政權的「聯衡」政策及其覆亡〉(《淮海工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等文發表。

21世紀的學術界還探討了南明失敗的原因。陳華林的〈南明將領降清與清朝的軍事勝利〉(《綏化師專學報》2000年第4期)和〈南明地主階級降清集團的心態探究〉(《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

第 2 期)、李瑄的〈南明抗清運動中明遺民的失落〉(《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8 年第 4 期)、王剛的〈試論弘光政權覆滅的歷史影響〉(《滄桑》2008 年第 5 期)、李忠明的〈文人政治品格與南明弘光政權滅亡關係初探——以錢謙益、吳偉業、陳子龍為核心〉(《江蘇社會科學》2012 年第 6 期)、彭偉的〈從《清宮揚州禦檔》看弘光政權敗亡〉(《檔案與建設》2014 年第 11 期)、杜景的〈一言難盡之永曆朝——永曆朝抗清失敗原因追溯〉(《貴州文史叢刊》2014 年第 4 期)、鄭晨寅的〈論黃道周、鄭芝龍關係與南明隆武朝之覆亡〉(《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15 年第 2 期)、高春平的〈試論內訌對南明永曆政權敗亡和抗清鬥爭的重大影響〉(《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尤淑君的〈從迎立之爭論南明弘光政權的失敗〉(《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龔劍鋒和孫健的〈浙閩沿海南明魯王政權的失敗原因和存在意義〉(《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段培華的〈南明緣何曇花一現?〉(《唯實》2017 年第 8 期)等，分別從投降心態、喪失民心、政治品格、權力爭奪等方面探討南明政權失敗的原因。

(二) 對南明人物研究的拓展

進入 21 世紀後，學術界對南明人物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拓展，發表了一大批研究論文，有從整體上進行研究的，如黃萬機的〈明清文化傳薪者——南明王朝遺民與貴州文化〉(《貴州文史叢刊》2014 年第 4 期)、薛以偉和楊年豐的〈明遺民以漢隱明之華夏正統論——以《藏山閣詩存》為考察中心〉(《社會科學戰線》2015 年第 11 期)等文。

有從個案上進行研究的，如林志儀描寫瞿式耜、張同敞的英勇事蹟的〈從容待死與城亡——一段南明抗清歷史的回顧〉(《文史春秋》2000 年第 4 期)、萬里的〈南明永曆時期的王夫之〉(《船山學刊》2001 年第 3 期)、王者香的〈南明抗清重臣黔東茶園山莊開闢者徐以暹行狀考〉(《銅仁師專學報》2002 年第 2 期)、馮祖貽的〈明清之際貴州歷史人物評價問題——以何騰蛟為例〉(《開發中的

崛起——紀念貴州建省 590 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集》，2004 年 6 月 30 日）、公羽的〈被歷史誤解的楊龍友〉（《文史天地》2008 年第 9 期）、黃萬機的〈南明抗清兩督師——史可法與何騰蛟之比較研究〉（《貴州文史叢刊》2015 年第 4 期）、殷雅輝和趙曉兵的〈民族英雄陳邦彥的愛國情懷〉（《蘭臺世界》2014 年第 36 期）、朱子彥的〈論左良玉起兵「清君側」〉（《社會科學戰線》2009 年第 9 期）、袁宗虎的〈顧炎武愛國主義言行考〉（《科教文匯》中旬刊 2010 年第 11 期）、戴松岳的〈南明孤臣 海東初祖——文化開台先師沈光文〉（《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2 年第 6 期）、鄧孔昭的〈沈光文史事詩事考析〉（《臺灣研究集刊》2020 年第 4 期）、姜曉霞的〈何蔚文年譜〉（《昆明學院學報》2015 年第 2 期）、盧正恒的〈明清之際浙江將領黃斌卿研究〉（《清史論叢》2015 年第 2 輯）、徐衛東的〈南明將領黃斌卿事蹟志疑〉（《明清論叢》2015 年第 1 輯）、何歌勁的〈何騰蛟殉難湘潭事蹟考〉（《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劉永霞的〈王船山與南明王朝〉（《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劉永霞的〈王船山《和梅花百詠詩》與文人氣節〉（《明史研究論叢》2015 年第 15 輯）、王雪華的〈論黃宗羲與南明行朝〉（《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張昭煒的〈方以智與南明永曆政權劄記〉（《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李華彥的〈阮大鍼的交遊網絡與弘光朝人事〉（《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伏自文的〈一個人與一個時代的苦澀——「明末孤臣」陳翼叔其人其詩〉（《雲南檔案》2016 年第 3 期）、朱華的〈秦良玉「忠貞侯」性質辨析〉（《三峽論壇（三峽文學·理論版）》2016 年第 3 期）、馮玉榮的〈「滄海棲薄軀」：幾社領袖徐孚遠與南明政權〉（《明史研究》2017 年第十五輯）、胡傳淮和陳名揚的〈南明宰相呂大器生平考述〉（《蜀學》第十三輯，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 年）、周霄的〈魯王監國時期張岱行實考補〉（《杭州學刊》2018 年第 1 輯）、蔡傑的〈南明政權下黃道周的心境轉變〉（《泉州師範學院學報》2018 年第 1 期）、李芳的〈南明勳臣張先璧魂歸何處〉

(《文史天地》2018年第8期)、曾育榮和廖章榮的〈趙之龍弘光朝政治活動考述——兼論乙酉之變後趙之龍的境遇〉(《決策與信息》2018年第9期)、楊春君的〈陳洪範事蹟考〉(《明清論叢》2018年第1輯)、朱定波的〈王忠孝的金門歲月及其人際交往〉(《閩台緣》2020年第2期)。

在人物研究個案中，以對雷躍龍的研究較為突出，比如朱供羅和雷興龍、余曉聰的〈雷躍龍年譜〉(上、下)(《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2、3期)、雷興龍和朱供羅、余曉聰的〈雲南明代文學家雷躍龍研究資料述論〉(《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雷興龍和朱供羅、余曉聰的〈雷躍龍任禮部尚書年代考〉(《文山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雷興龍和余曉聰的〈《明代職官年表》載雷躍龍甲申之變「降清」考辨〉(《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劉雲川的〈雷躍龍與地域文化研究〉(《明代雲南治理與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年10月26日)等6篇論文，這與作者之一雷興龍的個人興趣、家族使命和執著精神有關。

人物個案研究中，學界對南明逃禪的和尚多有關注。如林觀潮的〈隱元禪師和南明抗清人士的關係〉(《韶關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王路平的〈長嘯出紅塵 談笑超生死——錢邦芑逃禪出家考論〉(《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12期)、王德軍的〈屈大均「逃禪」與明清之際嶺南政治生態的變動〉(《湖北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薛以偉的〈閩爾梅與史可法交遊考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5年第6期)、江宏的〈情繫桂林——金堡與瞿式耜交遊略論〉(《桂學研究》2019年00期)等，都對逃禪的僧人及其活動作了探討。

此外，南明的奸臣、佞臣、貳臣等人物也備受關注。關於奸臣馬士英，就有王堯禮的〈南明首輔馬士英〉(《文史天地》2009年第1期)、顧朴光和顧雪濤的〈南明首輔丹青高手馬士英〉(《當代貴州》2013年第20期)、陽正偉的〈馬士英之軍事活動三題〉(《第十五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五屆戚繼光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8月19日)等3篇論文發表，對其舊有形象有所改觀。另有王剛的〈南明「奸臣」負面形象在後世的塑造——以田仰為例的

考察〉(《貴州文史叢刊》2013年第3期)對田仰的「奸臣」形象的塑造過程作了分析。此外,秦博的〈南明永曆朝佞幸嚴雲從事蹟考——兼論明代「文職蔭武」群體的政治庇護〉(《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對南明「佞幸」人物作了研究。翟愛玲的〈南明閣臣王鐸「貳臣」命運源釋〉(《中州學刊》2016年第2期)、彭勇的〈「從賊的貳臣」與南明政局走向:以柳同春為個案的研究〉(《明史研究》2017年第15輯)則對「貳臣」現象作了討論。

學者在進行人物研究時,還重視人物活動的地理環境,如岑永楓的〈楊文驄故居「石林精舍」〉(《貴陽文史》2010年第6期)、夏志剛的〈張蒼水被執地懸壘考〉(《浙江國際海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等。

在南明人物研究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對南明土官比較重視。王德軍的〈明清之際桂西土官政治抉擇再考察〉(《廣西地方志》2010年第2期;又載《隴東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黃佳熙的〈容美土司與南明政權的政治關係變化探究〉(《懷化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趙秀麗的〈明末清初鄂西土司的家國認同與族群利益——以易代之際鄂西土司的政治抉擇為中心的考察〉(《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16年第6期)等都對南明土司的政治抉擇作了研究。

鄭成功的研究仍然是南明史人物研究中的一個重點,發表了鄭阿忠的〈鄭成功父子三次進軍長泰抗清〉(《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陳振坤的〈鄭成功文物史跡考〉(《文物世界》2015年第3期)、李志強的〈李自成大順軍餘部參與鄭成功收復臺灣〉(《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王昌的〈鄭成功與魴港稅權爭奪〉(《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6年第3期)、麥青龢的〈鄭成功《致隱元禪師函》真偽考〉(《泉州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卞梁、吳妍和連晨曦的〈鄭成功領受「潮王」事略及其意義〉(《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田紀偉的〈亂世辨忠奸——論《桃花扇》中的武將形象〉(《戲劇之家》2019年第6期)等論文。鄭成功的研究中,也有新的變化,就是用新的方

法和視角去分析。如盛巽昌的〈「鄭成功」為組合符號〉（《史林》2000年第4期），分析了「鄭成功」姓名為鄭氏血脈、南明賜名「成功」以及清朝貶南明、去國姓「朱」而保留「成功」之名，所形成的複雜的文化符號。

（三）南明對外關係史研究的深入

這一階段，南明史的研究出現了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就是對南明對外關係研究大力拓展和加深。首先，從東亞格局探討南明的對外關係，有呂振綱的〈南明時期（1644–1662年）東亞國際體系的危機與重建——雙重政治主題下的清代朝貢體系生成史〉（《近現代國際關係史研究》2017年第2輯）等文。

其次，從南明與各國關係上探討南明的對外關係。上一階段，新中國學人已開始探討南明與羅馬的關係，以及隆武的外交關係。這一階段，對南明的對外關係的研究更加廣泛和深入，探討了南明與澳門、羅馬天主教會、日本、安南、琉球和緬甸的關係。

與澳門關係的研究，有陳文源的〈南明永曆政權與澳門〉（《暨南學報》2000年第6期）、王繼光的〈澳門史研究的新趨向——「16–18世紀的中西關係與澳門」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16–18世紀中西關係與澳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11月1日）、余定邦的〈澳門耶穌會傳教士與南明政權〉（《「16–18世紀中西關係與澳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11月1日）等文。

與羅馬天主教會關係的研究，有陳文源的〈西方傳教士與南明政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張西平的〈關於卜彌格與南明王朝關係的文獻考辨〉（《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2期）、善淵的〈波蘭漢學的奠基人：卜彌格〉（《國際漢學》2009年第2輯）、董少新的〈明末奉教太監龐天壽考〉（《復旦學報》2010年第1期）、孫景堯和龍超雲的〈永曆王朝耶穌會士「適應政策」的乖舛與敗因——從貴州安龍現存永曆政權的遺物談起〉（《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佚名的〈明末政權與洋教士〉（《國學》2010年第2期）、孫景堯和龍超雲的〈天主教與南明永曆王朝

關係蠡測——以安龍碑為中心》（《學術月刊》2010年第9期）及〈天主教與南明永曆王朝〉（《文史知識》2010年12期）、張中鵬的〈畢方濟與南明政權劄記〉（《中國市場》2011年第22期）、吳伯婭的〈西方傳教士：明清鼎革中的特殊角色〉（《滿學論叢》第四輯，2014年）、林建曾的〈天主教與南明永曆王朝〉（《貴州文史叢刊》2015年第1期）、彭建兵的〈天主教傳布黔西南布依族地區述略〉（《貴州文史叢刊》2015年第1期）、王銀泉的〈卜彌格：中醫文化西傳的拓荒者〉（《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7月19日）、夏風豔的〈南明永曆王朝與天主教〉（《中國天主教》2016年第4期）、韓琦的〈南明使臣卜彌格的中國隨從——教徒鄭安德肋史事考釋〉（《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鄒振環的〈張元濟的意大利之行與南明天主教文獻的發現〉（《安徽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等文。

與日本關係的研究，有南炳文的〈周鶴芝的姓名及其乞師日本〉（《明史研究》第七輯「謝國楨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專輯」，2001年）、〈南明首次乞師日本將領之姓名考〉（《史學月刊》2002年第1期）、〈南明政權對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兩種表現〉（《日本研究論集》2002年卷）、〈南明政權對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六種表現〉（《日本研究論集》2003年卷）、〈南明政權對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過程〉（《南開學報》2003年第2期）等文。除南炳文外，其他學者也對南明與日本關係作了討論，如祝求是的〈南明馮京第日本乞師一次考〉（《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劉曉東的〈南明士人「日本乞師」敘事中的「倭寇」記憶〉（《歷史研究》2010年第5期）、年旭的〈南明情報的日本傳播及其東亞影響〉（《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10期）、徐純均的〈南明鄭芝龍乞師日本初探〉（《福建史志》2020年第4期）等。

與越南關係的研究，有牛軍凱的〈南明與安南關係初探〉（《南洋問題研究》2001年第2期）、楊彥迪的〈1644-1684年中越海域邊界的海盜、反叛者及英雄——安樂博〉（《海洋史研究》第九輯，2016年）、吳元豐的〈南明時期中琉關係探實〉（《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陳文源和周亮的〈明清之際中越關係的演變

與抉擇》（《東南亞研究》2011年第1期）。

與緬甸關係的研究，有李金蘋和婁自昌的〈南明與緬甸關係中的幾個問題（1649–1662年）〉（《文山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

與朝鮮關係的研究，則有黃普基的〈17世紀後期朝鮮王朝政壇的「奉清」「崇明」之辨——以1667年南明漂流民事件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等文。

（四）南明史學史迅猛發展

南明史學史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迅猛發展。2015年7月，在貴州安龍召開了有史以來最早的一次南明史學術會議，出現了對南明史學進行總括的論文，如毛佩琦的〈為甚麼要研究南明史——在貴州安龍南明歷史文化研討會上的發言〉（《貴州文史叢刊》2014年第4期）和〈南明，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代序）〉（《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還出現了對南明史研究動態所作的報告，如李旻的〈專家齊聚 多緯度推動南明史文化研究〉（《當代貴州》2015年第29期）、唐保華的〈安龍縣南明史研究回顧與資源利用初探〉（《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和彭勇的〈南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15年第6期）。

這一階段的南明史學，既有對清代南明史學的研究，又有對新中國南明史學的研究。

關於清代學者對南明史研究的探討，出現了不少的成果。有從總體上進行研究的，如闞紅柳的〈清初私家修史狀況研究——以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為中心〉（《遼寧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李潤強的〈論清初士人的明史意識與士林陋習〉（《第十一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2005年8月1日）、吳航的〈百年來清代南明史撰述與研究的回顧〉（《中國史研究動態》2011年第1期）、趙洋的〈明遺民史家的歷史書寫〉（《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2015年第2期）、曹江紅的〈明清易代之際私撰明史風氣的興起及其消退〉（《明史研究論叢》第十二輯「明代國家與社會研究專輯」，

2014年)等。

有從個案上進行研究的，如傅玉璋的〈簡論溫睿臨與《南疆逸史》〉(《安徽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陳其泰和屈寧的〈故國之思與信史精神——萬斯同、溫睿臨與《南疆逸史》的編纂〉(《河北學刊》2009年第2期)、錢茂偉的〈邵廷采《西南紀事》與《東南紀事》研究〉(《寧波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徐麗的〈戴名世的史學關懷與特色〉(《廊坊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徐立望的〈重現史實：傅以禮與南明史研究〉(《浙江學刊》2009年第2期)、吳航的〈略說查繼佐的南明史論〉(《聊城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吳航和馬小能的〈查繼佐的南明史撰寫〉(《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0年第3期)、吳航的〈清朝官修《明史》關於南明歷史纂修的討論〉(《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1期)、吳航的〈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的學術價值〉(《廊坊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高國強的〈《狩緬紀事》概說〉(《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卷)、安藝舟的〈南明弘光朝重頒《三朝要典》的風波及其影響〉(《故宮學刊》2012年第8輯)、謝貴安的〈《安龍逸史》考論〉(《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又載《史學史研究》2016年第3期)、黃亦君的〈一個人的南明：王夫之與《永曆實錄》〉(《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李德楠的〈被書寫的南明史：乾隆《南籠府志》闕載安龍府原因蠡測〉(《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張祥光的〈永曆帝在安龍——讀屈大均《安龍逸史》〉(《貴州文史叢刊》2015年第4期)、方彥壽的〈南明建陽刻本《經國雄略》〉(《福建史志》2016年第1期)、于冬萃的〈張岱的史學與對晚明社會的認識——以《石匱書》《石匱書後集》為中心〉(《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陳岸峰的〈吳梅村書寫的南明政權及其批判〉(《南都學壇》2018年第6期)、秦浩翔和謝宏維的〈清代方志編纂與南明忠烈認同——以歷修《廣西通志》對「瞿張二公」的記載為例〉(《史志學刊》2020年第2期)、周少清的〈徐孚遠流亡詩中的江南書寫——以浙、閩為例〉(《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20年第18期)、楊海英的

〈復明運動海外秘密聯絡網管窺——《丁未傳信錄》所見的口述南明史〉（《清史論叢》2016年第2輯）、馬泰來的〈南明隆武朝史料《思文大紀》作者考證兼論紅雨樓藏書下落〉（《中國典籍與文化》2017年第3期）、王晨光的〈從南明哀思到經史互彰——章學誠釋經學方法的興起〉（《人文論叢》2016年第2輯）、尤學工和余康的〈論章太炎的明史研究〉（《史學史研究》2016年第4期）等。

在清代南明史個案研究上，錢澄之史學成為焦點之一。研究論文有楊年豐的〈試論錢澄之《藏山閣集》的詩史精神〉（《深圳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牟哥的〈管窺錢澄之史學思想〉（《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吳航的〈錢澄之南明史記載的認識與實踐〉（《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董根明的〈錢澄之史學思想初探〉（《安徽史學》2017年第4期）等。

關於清代朝鮮王國的學者對南明史的撰著，也有學者進行研究。孫衛國的〈朝鮮王朝所編之中國史書〉（《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2期）就是這方面的創新之作。此後，曾磊的〈朝鮮《續明史》史學思想研究〉（《南昌教育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張兆裕的〈朝鮮李朝所知之南明述略〉（《求是學刊》2015年第6期）等繼續探討這方面問題。

關於新中國學者對南明史研究的探討，出現了大量的成果。繼承上一階段的傳統，有不少學者對民國以降的南明史研究大家及其學術成就進行了探討。謝國楨受到了較多的關注，任道斌發表了〈謝國楨先生治史之經歷與成就〉（《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1期），涉及到其南明史方面的治學成就。此後，商傳的〈謝剛主師與《晚明史籍考》〉（《明史研究論叢》第六輯，2004年）、〈研究南明史料的一個鑰匙〉（《光明日報》2014年11月29日）和〈謝國楨史學志業考述〉（《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吳航的〈謝國楨先生與南明史研究〉（《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和〈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續補兼考〉（《淮北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等文對謝國楨的南明史治學成就予以總結。

民國時南明史大家朱希祖在上一階段未受關注，而此時則受到

重視。李培文發表〈朱希祖與鄺亭藏書〉（《江蘇圖書館學報》2001年第5期），周文玖發表〈朱希祖史學略論〉（《史學史研究》2004年第4期），姜勝利、王愛衛發表〈朱希祖與《明季史料題跋》〉（《華僑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等文。

顧誠在南明史上的某些探討受到質疑，施祖毓發表了〈高傑北征辨——兼與顧誠先生商榷〉（《東南學術》2001年第6期）一文，質疑顧氏認為高傑率軍北上非為抗清實為策應清軍的觀點。當然有質疑，也就有關注。顧誠《南明史》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再版後，有報導性文章相繼發表，如〈千元難求《南明史》 光明日報再版來〉（《出版參考》2011年第19期）、〈為真史學「衛道」：《南明史》新版亮相〉（《出版參考》2011年第28期）。接著，學者們發表相關書評和研究性文章，如孫獻濤的〈《南明史》：一部痛史的娓娓道來〉（《光明日報》2011年11月6日）、陳寶良的〈三讀《南明史》記〉（《博覽群書》2012年第6期）、王遙的〈學術之樹常青 思想之花長開——顧誠先生系列著作出版暨學術思想研討會綜述〉（《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3年卷）、王鐵男的〈以抗清鬥爭為主線的南明史研究新視角——評顧誠《南明史》〉（《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5年第16期）等。

柳亞子的史學成就繼續受到重視。學者們發表了一系列論文進行介紹和探究，如劉松林的〈柳亞子一生鍾情南明史研究〉（《世紀》2002年第4期）、章慕榮的〈無心插柳柳成蔭——柳亞子在「活埋庵」期間的南明史研究〉（《文史春秋》2003年第3期）、黃暉的〈柳亞子南明史料的奇遇〉（《文史天地》2004年第2期）、劉奎的〈危機與救贖：一個新文化人的「南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期）、金鈞的〈王念忱冒險搶救柳亞子珍貴史稿〉（《春秋》2018年第1期）等。

對於錢海岳的《南明史》，香港大學中文系卜永堅率先進行了評述，發表了〈錢海岳及其《南明史》：中國現代史學界的幽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9期，2009年）一文。

對於民國時另一個南明史的研究者黃裳，此時也有人關注。如

張承宇的〈鉤沉稽微 會心之論——黃裳的南明人物研究〉（《中國圖書評論》2003年第5期）一文。民國時武漢大學蘇雪林的《南明忠烈傳》也受到關注，馬鳳發表了〈借古喻今 以古勵今——論蘇雪林《南明忠烈傳》的創作目的〉（《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10年第6期）一文。

同時，新中國學者特別對抗戰時的南明史學作了討論，如魏華齡的〈抗戰時期的桂林史學研究——兼評田亮著《抗戰時期史學研究》〉（《抗戰文化研究》2008年第2輯）、區志堅的〈民族主義與歷史書寫：抗戰時期中國學者的明清史研究〉（《南開史學》2019年第1期）、吳舒潔的〈民族與階級視野中的「甲申史論」——「明亡三百年」與1940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1期）等。

成書於民國、修改於新中國的錢海岳的《南明史》，由中華書局於2006年正式出版，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除了相關著作大量徵引其內容外（查「讀秀學術搜索」可知），有人還對其手稿保持關注，張知常發表〈《南明史》120卷手稿入藏江蘇無錫市檔案館〉（《蘭臺世界》2011年第14期）一文。有人對其著作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考訂。如李淑燕發表了〈《南明史·藝文志》經部考異〉（《廈門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南明史·藝文志》經部標點錯誤六則〉（《天一閣文叢》第十輯，2012年）和〈《南明史·藝文志》經部著錄標準商榷〉（《天一閣文叢》第十二輯，2015年）三篇文章，對錢著《南明史·藝文志》中的部分失誤作出了考辨和修正。

此外，21世紀還出現了一批南明史學研究的碩士論文，下面再談。

（五）南明文學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上一階段，已經有學者研究南明詩人及其作品，對《桃花扇》的研究最為突出。進入21世紀後，南明文學史的研究得到更進一步發展。劉建明的〈論南明忠君絕命詩湧現的政治合力〉（《沈陽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潘承玉的〈南明文學文獻的當代傳播考

略》(《西北師大學報》2007年第5期),郭瑞林的〈黃鐘大呂,末世強音——淺論南明詩〉(《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張暉的〈死亡的詩學——南明士大夫絕命詩研究〉(《文學評論》2013年第4期)、劉建明的〈論南明詩文創作的政治走向〉(《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和〈論南明政權與詩文創作〉(《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顏智英的〈中國海戰詩學發展探論——南宋至南明的考察〉(《南海學刊》2016年第1期)、潘承玉的〈南明文學:七十年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興學科〉(《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等文,均從整體上探討南明的文學和詩學成就。姜曉霞的〈何蔚文詩歌創作簡論〉(《昆明冶金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5年第2期)、周明初的〈南明詞人方惟馨《菩薩蠻》的「詞史」價值〉(《文學遺產》2017年第3期)、何榮譽的〈南明大學士文安之佚詩輯錄〉(《貴州文史叢刊》2017年第3期)等文,則分別對南明文學史上的個案進行研究。其中,李真瑜的〈南內新詞送南朝——南明弘光朝宮廷戲劇〉(《紫禁城》2010年第3期)集中對弘光朝的宮廷戲劇進行研究,頗有特色。陳亮亮的〈乾嘉戲曲中的南明忠臣再現:瞿式耜與《鶴歸來》〉(《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20年第1期)則對南明文學中的戲曲個案《鶴歸來》作了探討。

南明文學史上的個案研究,最主要的仍然屬於《桃花扇》。《桃花扇》堪稱南明史的一個明顯標誌,因此南明史的研究繞不開對《桃花扇》的探討。進入21世紀後,關於桃花扇的研究繼續深入,一大批論文得以發表。如鄒自振的〈論孔尚任的《桃花扇》〉(《福州師專學報》2000年第4期)、吳慶晏的〈動盪社會的眾生相——《桃花扇》人物形象的再審視〉(《中文自學指導》2000年第6期)、楊健的〈封建王朝的挽歌,民族衰亡的史詩——紀念《桃花扇》發表300周年〉(《戲劇》2001年第1期)、陳美林的〈孔尚任及其《桃花扇》——《桃花扇校注》序〉(《藝術百家》2001年第3期)和〈論《桃花扇》——中英文對照版《桃花扇》前言〉(《中華藝術論叢》2007年第7輯)、顏健的〈論孔尚任對歷史人物侯方域的改造〉(《樂

山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顏健和左福生的〈論《桃花扇》塑造的武將形象〉(《隴東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羅暢的〈論《桃花扇》武將形象的塑造〉(《戲劇之家》2015年第3期(下))、孫之梅的〈史斷·詩意·哲思——《桃花扇》對歷史的超越〉(《蘇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葉玉露的〈桃花扇底風吹來——評新編古裝劇《李香君》〉(《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孫稽的〈藝術真實的演繹——《長生殿》和《桃花扇》的藝術價值〉(《戲劇文學》2009年第9期)、張玉亭的〈以離情演繹歷史興亡的主題——《桃花扇》賞析〉(《才智》2010年第1期)、何曉鐘的〈再讀孔尚任的《桃花扇》〉(《文學教育(上)》2013年第3期)、王亞楠的〈《桃花扇》第四十出《入道》的價值意義之再評價——以《桃花扇》的主題思想和結構模式為中心〉(《寧夏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周大雯的〈《桃花扇》中關於南明將士形象的塑造〉(《戲劇之家》2016年第10期)、張洋的〈從《桃花扇》看清初文人的反思意識〉(《中共濟南市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3期)等。

由《桃花扇》的研究，發散到南明妓女的研究。王淼的〈桃花得氣美人中——南明痛史與南明妓女〉(《書屋》2002年第6期)開其端緒，引起王燕的〈晚明「秦淮名妓現象」初探〉(《江淮論壇》2003年第6期)、曹瑞冬的〈論秦淮八豔與金陵十二釵的聯繫與影響——讀《紅樓夢》有感〉和〈論青樓文化與江蘇文化的聯繫與影響——以秦淮八豔為例〉(《江蘇社科界第八屆學術大會學會專場應徵論文論文集》，2015年)等文的續作。

2018年10月，中國明史學會在江蘇鹽城召開了「孔尚任暨鹽都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農業考古》的主編發表〈孔尚任暨鹽都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在鹽城召開〉(《農業考古》2018年第6期)會議通訊。與會者討論《桃花扇》及其作者孔尚任。楊緒敏發表〈論孔尚任的民族情緒的形成及對南明速亡原因的總結〉(《孔尚任與鹽城——孔尚任與鹽都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年10月25日，又發表於《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此次會議促進了《桃花扇》的相關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張暉研究南明詩人與王朝關係的專著《帝國的流亡——南明詩歌與戰亂》的出版。³¹有人稱，「這本書稿得以修訂出版，並在文化界產生了較大的反響。借此機會，『南明』這個有些冷門的歷史名詞，又重新返回文化界的視野中心」。並稱「不少史學家站在狹隘的民族主義角度，為南明王朝唱挽歌。當然，我們可以這樣說，清王朝到了末期，飽受列強欺凌，製造了中國歷史上最深重的民族災難，但我們也要肯定康熙、乾隆等君主在治國理政上的作為。」³²

（六）對南明思想和文化進行研究

21世紀後，南明史的研究向縱深發展，南明思想和文化研究成為一個創新點。孫宇凡發表了〈捍衛意識形態正當性：天命—正統與明清易代〉（《清華社會學評論》第八輯，2017年），劉華安、李磊明發表了〈多維度闡釋全祖望思想 傳承浙東優秀傳統文化〉（《寧波日報》2016年4月14日），蘇謙、徐大軍發表了〈南明時期馮夢龍的身分意識轉換探究——以「義」為中心〉（《明清小說研究》2018年第1期），毛文芳發表了〈孝著丹青：明末黃向堅「萬里尋親」的多重文本交織〉（《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年第2期）等文，分別討論了南明的正統觀念和學者思想，特別是通過身分意識轉換和文本解析來強化研究，頗有啟迪意義。

此外，司亞勤、王路平發表了〈明季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原因探蹟〉（《貴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一文，認為南明君臣承明朝遺規，對滇黔之地的佛教寺院注意保護和修建，明朝遺民為全志節，逃禪出家，傾注精力於佛教事業。王路平還發表了〈明末清初貴州佛教論綱〉（《貴州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一文，部分內容是對南明佛教的研究。此後他又發表了〈南明王朝護持滇黔佛教考

31 張暉：《帝國的流亡——南明詩歌與戰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32 韓晗：〈流離之君的挽歌〉，《中國民族報》2014年9月12日，第9版。

論》（《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一文。

（七）南明社會史研究的開拓

新世紀到來後，中國史學的理論、方法和視野有了較大的發展，施諸南明史的研究，極大地拓展了其研究領域。特別是南明社會史的研究，是新世紀新中國史學的一大進展。有對南明家族史進行研究的，如李建軍的〈南明永曆朝廷與雲南沐氏家族關係考〉（《南開學報》2000年第6期）、朱忠文的〈論明代開國功臣家族在弘光朝的活動——以劉孔昭為中心的考察〉（《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有對南明社會群體進行研究的，如吳琦、趙秀麗的〈儒佛互補：明清易代之際嶺南士人的行為特徵〉（《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陳華林的〈道德和利益的衝突——南明各社會群體複雜心態的原因探析〉（《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陳興中和陳竹的〈沒有躍過龍門的魚——淺議何騰蛟兼及明季貴州知識分子群體的崛起〉（《貴州文史叢刊》2005年第4期）；還有對西南邊疆內地化現象的研究，如賽波的〈李定國與雲南邊疆「內地化」開發的文化背景〉（《邊疆經濟與文化》2017年第4期）等。上述研究，多是前兩個階段所欠缺的學術現象。此外，李慶新的〈16-17世紀粵西「珠賊」、海盜與「西賊」〉（《海洋史研究》2011年第2輯）分析了南明時廣東西部「珠賊」和「海盜」等社會成員情況。

（八）農民軍「聯明」抗清研究不再盛行，但不絕如縷

進入21世紀後，自建國之初便流行的農民軍「聯明抗清」的研究，雖有繼續，但不再風行。李建軍的〈孫可望、李定國等部農民軍與南明永曆朝廷關係考〉（《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年第5期）仍然認為孫可望等人的行為屬於聯明抗清。類似的論文有熊宗仁的〈南明時期抗清的歷史正當性辨析——兼論孫可望領導的大西軍餘部與永曆王朝的「聯合恢剿」〉（《貴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王維的〈大西軍餘部與清軍衡州之戰考論〉（《船山學

刊》2006年第3期)等。張仕榮的〈明清之際的一次「遵義會議」〉(《文史天地》2007年第12期)則強調了孫可望、李定國在遵義會議上決定「聯明抗清」是一次歷史轉折。滕新才〈「西山十三家」的三峽情結〉(《三峽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龍西斌的〈試析李自成、大順軍聯明抗清的意義〉(《第十三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8月10日)、朱寅和張金銑的〈榆園軍敗因新探〉(《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朱寅和劉同幹的〈榆園軍：反清復明的一曲悲歌〉(《雞西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曾磊的〈二十世紀大順軍餘部「聯明抗清」研究綜述〉(《船山學刊》2013年第3期)、劉中平的〈南明史上農民軍提早聯合問題的思考〉(《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均在繼續探討農民軍的抗清鬥爭或「聯明」抗清的政策。

然而，這時已有學者對農民軍「聯明」抗清說提出異見，如曾磊在〈「聯明抗清」說質疑〉(《焦作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2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中國大陸明史學界基本上把原農民軍餘部稱作「大西軍餘部」、「大順軍餘部」，將他們同南明朝廷的關係稱作「聯合」，值得商榷。事實上，原大西軍、大順軍餘部同南明朝廷的關係依然是傳統專制皇權下的君臣關係，並不存在「聯合」的關係。

與聯明抗清相反，李小林關注到南明弘光政權的「聯清滅順」方針，在〈評析南明弘光政權的「聯清滅順」方針〉(《第十二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8月21日)一文中予以揭示。田波甫對此也發表了〈最無遠見的政略——南明「借虜滅寇」的自以為是〉(《深交所》2007年第12期)一文，對南明政權的無識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九) 南明史料的繼續拓展及南明史實的考訂分析

21世紀後，中國學術界在南明史料的基礎上繼續拓展和探討。首先，是對南明文物印璽、錢幣、墓碑等進行研究。對南明印璽的研究，有楊光執的〈古印訴說南明事〉(《湖北檔案》2000年第10

期)、夏颯的〈古今藏寶之謎(連載之三)——南明桂王金印珍寶〉(《鄉鎮論壇》2001年第6期)、鄭鑫的〈南明「吏部文選清吏司之印」賞析〉(《春秋》2006年第3期)、陳剛的〈南明「提督川陝總兵關防」印考釋補遺〉(《文物鑒定與鑒賞》2018年第2期)、賴建泓的〈三方南明「永曆」年款官印淺析〉(《福建文博》2010年第2期)、鄭培分的〈援江將軍之印考釋〉(《博物館藏品架起溝通的橋樑——廣西博物館協會首屆學術研討會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第七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年12月21日)等文;對南明錢幣的研究,有葛群的〈漫談南明時期的錢幣〉(《合肥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曹家東的〈「隆武」鐵範銅錢〉(《內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5輯)、錢存浩的〈南明時期燦爛多姿的貴州錢幣〉(《開發中的崛起——紀念貴州建省590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集》,2004年6月30日)、汪有民的〈重新認識南明弘光政權與弘光錢〉(《江蘇錢幣》2006年第2期)、沙忠平和陳玉安、李宏波的〈陝西安康再次發現南明永曆、興朝錢〉(《西部金融》2011年第4期)、孫仲匯的〈南明永曆錢背文〉(《江蘇錢幣》2012年第4期)、蔣將的〈永曆通寶背「督」字錢與精忠報國的抗清三傑〉(《江蘇錢幣》2012年第4期;又載《東方收藏》2013年第2期)、〈南明桂林鑄錢概述〉(《收藏》2012年第9期)、林建順的〈臺灣南明鄭氏第四次鑄錢考析〉(《中國錢幣》2013年第5期)、林南中的〈南明鄭氏政權鑄錢小考〉(《東方收藏》2017年第10期)、王連根和王權的〈南明魯王鑄大明通寶錢〉(《收藏》2019年第6期)等文;對墓碑的研究,有閔曉青的〈「嶺南三忠」張家玉墓碑考釋〉(《嶺南文史》2010年第2期)、孫和軍和莊世維的〈明誥贈太夫人鄭氏墓碑訪考〉(《舟山日報》2012年3月21日)等文。此外,還有對南明遺物進行研究的,如葉倬璋的〈一件南明烈士遺物的流轉〉(《中國文化》2019年春季號)。

其次,是對檔案進行的研究。有南炳文的〈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瞿式耜七篇奏疏抄寫時代考〉(《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2期)、謚必民的〈有關南明尹三聘的幾件史料〉(《歷史檔案》2003年第1

期)、李小林的〈馬紹愉、陳洪范致吳三桂書之史料價值〉(《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2期)、湯開建和王婧的〈關於明末意大利耶穌會士畢方濟奏摺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1期)、何正標的〈「揚州十日」真相——南明遺民王秀楚手記解析〉(《滄桑》2008年第1期)、〈湖南檔案鎮館之寶：南明聖旨隱藏民間300多年〉(《蘭臺世界》2009年第1期)、〈安化縣檔案館「鎮館之寶」——南明永曆皇帝聖旨〉(《檔案時空》2009年第5期)、張軻風的〈《永曆帝致吳三桂書》校釋〉(《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卷)、龍尚學的〈南明永曆七件敕諭的史料價值〉(《貴州文史叢刊》2015年第4期)、夏小雙的〈寄跡惟憑一葉船：瞿式耜三通手劄中之家事與國事〉(《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張榮芳的〈南明重臣瞿式耜——讀陳垣一幅珍貴遺墨〉(《廣州文博》2017年第1輯)、何榮譽和姚丫的〈南明大學士文安之佚文輯考〉(《三峽論壇(三峽文學·理論版)》2019年3月25日)、程存潔的〈入粵為尋紹武來〉(《中國文物報》2016年12月13日)等文。

再次，是對南明史料書籍進行的校證。這方面的成果有方福祺的〈《也是錄》箋證〉(《西南古籍研究》2005年卷)、陳支平的〈福建民間族譜中所見南明史料輯述〉(《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陳妍晶的〈南明雲南刻本和寫本佛經考略〉(《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卷)、欒孟留的〈《鮚埼亭集》的史料學價值〉(《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唐立宗的〈晚明清初李開先《盤餐錄》筆下的亂世經歷〉(《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何先龍的〈貴州南明遺臣事蹟初考——以民國《貴州通志·人物志》為例〉(《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郭嘉輝的《「南都舊事」——南明諸位臣文集揭微：以《賜誠堂文集》作探析》(《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陳支平的〈《惠安王忠孝公全集》與明末清初閩台史事〉(《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勵雙傑的〈南明永曆二年刻本《伍氏族譜》考〉(《天一閣文叢》第十五輯，2017年)、陳茗和陳慶元的〈南明隆武刻本《惠風》初探〉(《閩江學院學報》2020

年第 4 期)。

此外，金申在〈失而復得的南明美人畫〉(《收藏》2012 年第 9 期)一文中，講述其於 1988 年在日本開畫廊的增田氏琦玉縣家中，發現一幅雙美圖，左上角有題款：「隆武二年歲在丙戌暮春之初，為羽之尊叔大辭壇寫，(余)圮。」³³ 在裝此畫的木盒蓋內有清代朱彝尊的題記「戊午首春觀於媚志園中」。³⁴ 該畫為明末清初福建莆田人余圮所作，是南明時創作的繪畫藝術作品，對於研究南明藝術史彌足珍貴。

進入 21 世紀後，學者們對南明歷史事件和相關史實進行了考訂和分析。扈耕田的〈晚明復社《留都防亂公揭》事件新議〉(《史學月刊》2011 年第 8 期)、潘猛補的〈顧錫疇之死疑案定讞——兼論南明隆武時的溫州〉(《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 年第 2 期)、阿風的〈明季徽州府「黔兵案」及其對南明政局的影響〉(《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李治國的〈明清地位的轉捩點——南明左懋第使團的禮儀探析〉(《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7 月 7 日)、高壽仙的〈南明永曆初年一次夭折的改曆事件〉(《明史研究》2017 年第 15 輯)、王群韜和全洪雲的〈南明永曆元年桂林之役史實考辨〉(《廣西地方志》2017 年第 5 期)等，分別對「留都防亂公揭」、顧錫疇被殺疑案、徽州黔兵案、左懋第出使清朝、永曆改曆、桂林之役等事件和史料作了討論。

(十) 學位論文的橫空出世與南明史教育的發展

新中國的學位教育很早就有，但並未出現一篇南明史的論文。進入 21 世紀後，關於南明史的學位論文層出不窮。雖然博士論文中，只有一部以「南明」為名的著作，那就是吳航的〈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5 年，修改後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但那些題目中沒有標明而實際上屬於南明史的博士論文，則仍有多種，如季翠霞的〈阮大鍼傳奇研究〉(上海：

33 金申：〈失而復得的南明美人畫〉，(《收藏》2012 年第 9 期，頁 144。

34 同上注，頁 145。

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4月）、何甄芳的〈侯方域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8月）、張啟龍的〈明清鼎革時期廣東地方武裝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12月）等。

在碩士論文中，有關南明史的研究頗為可觀。直接以「南明」為題的碩士論文有16篇。它們是金字平的〈清廷與南明弘光政權關係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5月）、王尤清的〈思想傳承與文化重構——貴州南明遺民逃禪研究〉（貴陽：貴州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5月）、高小娥的〈「往事南朝一夢中，興亡轉瞬鬥秋蟲」——有清一代南明研究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5月）、韓燕飛的〈抗戰時期的南明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5月）、高振華的〈南明弘光政權黨爭研究〉（武漢：中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彭澎的〈民族主義視域中的南明敘事——蘇雪林《蟬蛻集》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4月）、王豔的〈錢海岳《南明史·本紀》校讀劄記〉（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1月）、李箭的〈《明季南略》中有關南明政權在廣西活動史實之研究〉（南寧：廣西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13年6月）、孫曉龍的〈南明黨爭述論〉（西寧：青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4月）、莫紫薇的〈歷史書寫與文化博弈：清朝南明史書寫的歷史學考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5月）、苗占坤的〈王鐸與南明弘光政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4月）、左敏行的〈南明士人的流亡書寫——以徐孚遠為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5月）、鮑宇的〈南明武將群體研究（1644-1662）〉（沈陽：遼寧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5月）、朱琳的〈天儒夾縫中的南明重臣瞿式耜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5月）、朱少芬的〈南明興亡扇底傳——《桃花扇》中的南明書寫〉（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5月）、蘇謙的〈南明時期馮夢龍身分意識轉換研究〉（杭州：杭州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5月）。

至於未標明「南明」，而內容屬於南明史的，則為數甚多。其中王建華的〈論高傑與弘光政權〉（長沙：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6月）和王剛的〈清初江南戰事中的弘光四鎮降軍〉（南京：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5月）直接以「弘光」為題，顯係南明史無疑。

有專門研究作為南明標誌性文學符號的《桃花扇》的碩士論文，如臧守剛的〈侯方域與雪苑社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6月）、吳喆的〈《桃花扇》中侯方域、楊龍友形象考論〉（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5月）、楊淑英的〈《長生殿》和《桃花扇》比較研究〉（蘇州：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5月）、丁潔宇的〈梁啟超《桃花扇注》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6月）、程雅婷的〈論《桃花扇》中的楊龍友形象〉（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5月）等。

還有研究南明史籍的碩士論文。如霍偉婧的〈《明季實錄》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4月）、馬延嬌的〈《永曆實錄》校讀劄記〉（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6月）、曹文婷的〈溫睿臨與《南疆逸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3月）、王豔的〈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校讀舉異〉（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3月）、張存榜的〈《明末忠烈紀實》與《皇明四朝成仁錄》之比較研究〉（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5月）、高國強的〈《狩緬紀事》校注〉（昆明：雲南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5月）、王映霞的〈《小腆紀傳》校讀劄記〉（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2月）等分別對南明史籍《明季實錄》、《永曆實錄》、《南疆逸史》、《四朝成仁錄》、《明末忠烈紀實》、《狩緬紀事》、《小腆紀傳》進行了研究。

還有研究南明人物的碩士論文。黨波濤的〈解讀夏完淳〉（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5月）、武志佳的〈阮大鍼生平事蹟考論〉（湘潭：湘潭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5月）、鄭小華的〈徐鼎的史學成就〉（蘭州：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5月）、

馮亞琴的〈黃宗羲的歷史書寫研究——以時代變局下的人物形象塑造為視角〉（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5月）、楊光壘的〈邵廷采學術研究〉（蘭州：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5月）、胡雅婷的〈揭重熙研究〉（紹興：紹興文理學院碩士論文，2018年5月）、徐志強的〈姜曰廣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6月）、丁方平的〈明清之際左懋第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5月）、譔責義的〈抗戰時期史可法民族英雄形象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5月）等分別對夏完淳、阮大鍼、徐燾、黃宗羲、邵廷采、揭重熙、姜曰廣、左懋第、史可法等南明歷史人物作了探討。其中有三篇論文研究南明人物的文學成就，即魏建毅的〈瞿式耜詩文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5月）、王美的〈馬士英文學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4月）和曹楷的〈張煌言生平及詩歌考論〉（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6月）。

還有對明末清初歷史特別是明遺民史進行研究的碩士論文。王濤的〈農民戰爭、國家統一與民族衝突——明末清初山東榆園軍起義考述〉（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4月）、陳鑫磊的〈鼎革之變中朱明政權與耶穌會士的軍事政治合作〉（寧波：寧波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1月）、閔俊利的〈明清之際遺民與桂北寺院的興建——以桂林棲霞寺為中心〉（南寧：廣西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5月）、樂志傑的〈流寓臺灣明遺民及其著述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6月）、趙洋的〈衝突與調和：明遺民史家群體與清初的歷史書寫〉（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5月）、劉洋的〈明末清初雲南沙定洲之亂研究〉（昆明：雲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5月）、阮戈的〈明清鼎革及其對潮州地方社會的影響——以鄭成功在潮活動為中心（1646-1660）〉（廣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19年4月）等文，均是在研究明末清初時涉及到南明史的研究。

此外，還有朱儒超的〈清末的明史情結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廣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17年5月）、李晉的

〈謝國楨史學研究〉（揚州：揚州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4月）等，均從不同側面涉及到南明史的研究。

四、新中國南明史研究的特點

（一）南明史仍常處於明清史研究的夾縫中。

新中國七十年來，南明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南明史仍然處在明史和清史研究的夾縫中，有時候處境比較尷尬。南明史的研究，常常是在研究明史或清史時順便提及或展開敘述。大量的論文以「明末清初」或「明清之際」為題，將南明的敘述隱含其中。如唐志敬的〈明末清初廣西督、撫拾遺〉（《廣西地方志》1997年第1期），對南明廣西督撫的敘述是嵌入「明末清初」之中的。周喜峰的〈明清鼎革中的漢人及其華夷思想〉（《滿學論叢》第四輯，2014年）也是將南明的漢人放置在「明清」兩代之間敘述。張宏偉、彭勇、李鳳霞的〈從「懷慶之役」到「睢州之變」——論明清之際三大軍事力量對河南的爭奪〉（《中州今古》2002年第6期）所涉及的三大力量包括南明，但標題卻是「明清之際」，隱沒了南明的標識。

有很多學者對南明史事的敘述，是在研究明史時，從明朝的角度展開的。如徐江的〈吳梅村八年遺民時期的詩歌創作與政治心態〉（《河南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將吳偉業的身分界定為「前明遺民」，而非南明遺民。劉麗的〈甲申之際明朝士人心態與選擇〉（《北方論叢》2009年第1期）一文，將就甲申之際轉投南明的士人，一律視為「明朝士人」。柳旦超的〈明朝監國制度探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3月），將南明弘光政權、魯王監國政權等都置於「明朝監國制度」的背景下。袁小滉的〈明代中後期宮廷涉外交往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5月），則將南明各朝的涉外交往，放在「明代中後期」這一框架內敘述，南明的特色隱而不彰。

同樣，很多學者在研究清史時，從清朝的角度來處理和敘述南明的歷史。如王戎笙的〈關於清初的戰爭問題〉（《史學集刊》1986

年第1期)，是從清初的戰爭角度，涉及到與南明的戰爭。王貴文、常江的〈清初主要社會矛盾是甚麼？〉（《遼寧大學學報》1986年第6期）把南明與清朝的矛盾置於「清初」背景之下。類似的論文還有陳啟漢的〈清初廣東的抗清鬥爭〉（《嶺南文史》1987年第2期）、畢建宏的〈清初社會主要矛盾問題略議〉（《史學月刊》1988年第3期）、林子雄的〈清初兩藩攻占廣州史實探微〉（《嶺南文史》1996年第3期）、趙展的〈清軍進關取勝是三方面勢力角逐的結果〉（《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封志良的〈劉三湘父子：大清一統天下的功臣〉（《檔案時空》2016年第1期）、王剛的〈順治朝的江南控制策略〉（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5月）等，均是從清朝的角度來觀察南明史。高翔在〈1998年清史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3期）中，將南明史研究取得的成就，置於「清史」之下。趙文凱的〈康熙、乾隆時期的「明史觀」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4月），將清代康乾諸帝對南明史的態度作為「明史觀」來處理，不僅淡化了南明，更將這種敘述置於「康熙、乾隆時期」的清史敘述之下。

如果說上述論文只是一個研究角度的話，那麼下面的這些論文則代表了作者的立場。清史學者有時候會在清朝與南明的對峙中，偏向於自己研究的對象。如左書諤的〈清朝統一是歷史的必然〉（《滿族研究》1986年第3期），稱南明是「由故明遺臣在北京政權覆亡後擁立朱明王子王孫們在南方建立的腐朽政權」，並強調「其腐敗不堪」，「失敗是必然的」，³⁵從而證明「清朝充滿生氣與活力，代表了向上發展的勢力」，「代表了歷史發展的趨勢」，所以其統一是「歷史的必然」。³⁶為此，有些學者甚至忽略了清朝在統一過程中的屠殺行為。金寶森的〈《揚州十日記》證訛〉（《滿族研究》1989年第3期）通過考證，試圖證明《揚州十日記》及其所載事實都屬偽造。蒙進君的〈清初廣西平叛戰爭相關諸問題探討〉（桂林：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6月）也將廣西將領投降南明稱為叛

35 左書諤：〈清朝統一是歷史的必然〉，《滿族研究》1986年第3期，頁5。

36 同上注，頁9。

亂，對他們的鎮壓是「平叛」。當然，上述學者也多是從學術研究出發，他們的觀點也值得重視。然而無論上述何種情況，都說明了南明史尚無法擺脫明清兩朝擠壓的尷尬局面。

（二）南明史多學科、多角度研究的特點

雖然南明史常處在明清史的夾縫中，但也正因為它的多面性，使其研究角度和方法呈現多樣性的特點。新中國 70 年來，南明史研究的角度和學科呈現出豐富的狀貌。

從政治史角度的研究，是南明史之所以成立的基礎。南明史就是明朝滅亡後，幾位皇室後裔在南方建立的王朝政權，充滿了政治色彩，因此新中國的南明史研究始終未從此一視角上移開。謝國楨、顧誠、南炳文等人的南明史著，都是通過農民軍與南明王朝的政治聯合徐徐展開的。除了政治史外，新中國學者還從軍事史角度進行南明史的研究，南明諸政權一建立，就處在清軍的軍事威脅之下，新中國史學家自然不少了從軍事角度進行探討，上述諸大家的南明史著，也是一部部南明軍事史。前揭陳華林的〈南明將領降清與清朝的軍事勝利〉和陽正偉的〈馬士英之軍事活動三題〉都直接以軍事為題進行研究。從外交史角度研究，是新中國史學家對南明史的一大貢獻。如馮佐哲的〈南明出使羅馬教廷的卜彌格〉、戰繼發的〈隆武對外政策初探〉、李金蘋和婁自昌的〈南明與緬甸關係中的幾個問題（1649-1662 年）〉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從歷史文獻、史學史的角度研究南明史，出現了吳楓的〈歷史文獻學四十年之我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 年第 5 期）、方祖猷〈清初搜集南明文獻述略〉（《史學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周祥森〈1997-1999 年史學評論狀況評析〉（《史學月刊》2001 年第 2 期）、寧泊的〈清人明史研究中的正統觀和忠義觀〉（《南開學報》1996 年第 4 期）等成果，多從文獻學和史學的角度，涉及到南明文獻和史書的研究問題。從地方史的角度研究南明史，也是新中國史學家的一個亮點。如王守文的〈孫可望占據滇黔始末〉、方群達的〈鄭成功與雲霄〉（《政協天地》2012 年第 6 期）、戴松岳的〈南明孤

臣 海東初祖 —— 文化開台先師沈光文〉、何先龍的〈南明王朝在貴州有關重要史實考〉（《黔西南日報》2014年8月15日）、張雲健的〈南明悲歌中的貴州印記〉（《文史天地》2017年第2期）等，皆將南明史置於地方史的框架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從社會史角度研究南明史，是新中國史學家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這也是「新史學」運動導致的「史學下移」和從個人到群體轉移的結果。比較新穎的是對南明時代少數民族社會的研究，出現了黃義仁的〈從南明王朝播遷安龍到王囊仙起義後的布依族社會〉、吳旭的〈明末清初峽區土司對外關係的變化〉（《民族論壇》1996年第3期）。對社會群體的研究也受到重視。如鮑宇的〈南明武將群體研究（1644-1662）〉、趙洋的〈衝突與調和：明遺民史家群體與清初的歷史書寫〉等碩士論文，便致力於南明社會群體的探討。即使對傳統精英的研究，也轉到其社會生活，如區志堅的〈略論明遺民查繼佐晚年生活之研究〉（《中國文化研究》1996年第4期）就是如此。社會史還包括社會成員之間的交遊。對此，李華彥〈阮大鍼的交遊網絡與弘光朝人事〉（《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朱定波〈王忠孝的金門歲月及其人際交往〉（《閩台緣》2020年第2期）、江宏〈情繫桂林 —— 金堡與瞿式耜交遊略論〉等文都對南明文人的交遊情況作了探索。

（三）新中國南明史研究注重理論方法

與清代南明史以編寫敘事為特點、民國南明史以搜集材料為特點相比，新中國南明史研究的特點在於其對理論方法的重視、運用和提高。新中國建立後，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為指導，突出南明史中農民起義軍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改革開放後，理論方法得以大量引進和應用。

首先，比較方法得以普遍應用。如劉曉峰的〈《桃花扇》與《羊脂球》之比較研究〉（《經濟與社會發展》2004年第6期）、張文博的〈《桃花扇》與《春香傳》比較研究〉（延吉：延邊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將《桃花扇》與法國和朝鮮的相似作品進行比較；劉

中平的〈南明弘光政權與清朝幾種政策的比較研究〉和〈清朝與南明弘光稅策的得失比較研究〉則將清朝與南明的政策進行比較；黃萬機的〈南明抗清兩督師——史可法與何騰蛟之比較研究〉則將南明的兩個著名抗清大臣加以比較。通過比較，將兩種比較對象之間的異和同突顯出來，找到它們之間的本質聯繫，提高對研究對象的認識。

其次，應用心理學方法，開拓心態史領域。

心態史是法國年鉴學派提出的史學觀念，對新中國南明史研究產生了影響。如吳鵬的〈論楊龍友的文化選擇——兼論晚明士人的「殉死」心態〉（《開發中的崛起——紀念貴州建省590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集》，2004年6月30日）、陳華林的〈道德和利益的衝突——南明各社會群體複雜心態的原因探析〉（《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陶清的〈明清鼎革與文人心態——關於明清之際思想史研究範式的思考〉（《安徽史學》2006年第6期）、商傳的〈晚明士人生活心態與明亡歷史的寫照——以楊文驄及其詩文為中心的考察〉（《學習與探索》2009年第5期）、林揚潔的〈明清易代之際溫州文士心態探析〉（杭州：浙江工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10月），都是對不同群體特別是士人心態的分析和討論。

再次，文化學、社會學理論的應用比較普遍。

新中國南明史研究中，出現了應用文化學、社會學理論，分析文化重構、社會身分認同或轉換等問題。包青山的〈士人精神與文化重構——論《白門柳》中的晚明敘事〉（南寧：廣西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5月）就對《白門柳》中存在的文化重構現象作了分析。還有學人對社會形象塑造、社會身分認同（identity）和身分意識轉換等問題比較熱衷。如蘇謙、徐大軍的〈南明時期馮夢龍的身分意識轉換探究——以「義」為中心〉、閔鳴的〈明末清初政治書寫研究——以時代變局中的形象塑造與身分認同為視角〉（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4月）、李揚帆的〈湧動的東亞——明清易代時期東亞政治行為體的身分認同〉（《國際政治研究》2010年第3期）、盛巽昌的〈「鄭成功」為組合符號〉等文，

對身分塑造、認同和轉換進行了探索。

復次，傳播學理論得到應用和推廣。

新中國南明史研究中，傳播理論的應用得到重視。如潘承玉的〈南明文學文獻的當代傳播考略〉、王晨燕的〈明清交替之際的信息傳播與社會影響——以馮夢龍的歷史著述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4月）、陳仕國的〈《桃花扇》接受史研究〉（臨汾：山西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等，均應用傳播學理論，對有關南明的文獻、信息傳播進行了分析。

最後，應用史學理論，剖析歷史書寫。

新中國史學家們應用史學理論，分析傳統史學的歷史書寫問題，從而對過去塑造的歷史人物形象進行解構。王剛的〈南明「奸臣」負面形象在後世的塑造——以田仰為例的考察〉對「奸臣」田仰的負面形象的構造過程作了剖析。趙洋的〈明遺民史家的歷史書寫〉、李德楠的〈被書寫的南明史：乾隆《南籠府志》闕載安龍府原因蠱測〉、龐思純的〈南明王朝中的貴州群像〉（《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7月7日）、沈茂華的〈追憶英雄：南明人物的傳說、歷史與塑造〉（《清史論叢》2015年第2輯）、馮亞琴的〈黃宗羲的歷史書寫研究——以時代變局下的人物形象塑造為視角〉、左敏行的〈南明士人的流亡書寫——以徐孚遠為例〉、朱少芬的〈南明興亡扇底傳——《桃花扇》中的南明書寫〉等都對有關南明的歷史書寫作了研究。

五、結語

新中國70年來，南明史的研究從低潮到高潮，不斷發展，經歷過建國至文革、改革開放至20世紀末、21世紀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新中國南明史研究的創立階段。由於新政府有著「農村包圍城市」的成功經驗，因此在南明史研究上重視農民起義軍，南明史體系和研究主題都是以突出農民軍的聯明抗清為主線；第二階段，是南明史研究承上啟下的過渡階段，主要的南明史專著，如南

炳文、顧誠的兩部《南明史》，仍然重視農民軍在南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南炳文也注意到農民軍與南明政府並非簡單的聯合關係，而是「擁明抗清」，南明史研究開始去政治化。與此同時，大量的學術論文得以發表，對南明的各個方面進行探討。第三階段，是21世紀南明史高速發展的階段，政治色彩變淡，學術性增強。以南明帝王譜系為主線的錢海岳的紀傳體《南明史》14冊得以出版，《弘光政權研究》、《帝國的流亡：南明詩歌與戰亂》、《南明浙東遺民詩歌研究》、《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等專著不斷問世。學術論文井噴式地湧現，研究範圍遍及南明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社會等各個方面，研究理論和方法不斷充實和改進。南明史研究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而呈現興旺的局面，出現了一批批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形成後浪推前浪之勢。不足之處，一是南明的概念和範圍尚無公認的定義，或以南明諸帝興廢為界，或以農民軍興亡為據，或以鄭成功政權滅亡為下限，不一而足；二是除了吳航的學位論文外，直接以「南明」為題的博士學位論文尚未出現，南明史教育水準尚待進一步提高。

引用書目

- 敖運梅：《南明浙東遺民詩歌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
- 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初版，2003年再版；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
- 郭影秋：《李定國紀年》。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柳亞子：《南明史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劉中平：《弘光政權研究》。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年。
- 龍西斌，余學群主編：《第八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毛一波：《南明史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
- 南炳文：《南明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
- 錢海岳：《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Struve, Lynn A. 司徒琳.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著，李榮慶等譯，嚴壽澂校訂：《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增訂本）。
- 吳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
- 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 張暉：《帝國的流亡：南明詩歌與戰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 張玉興：《南明諸帝》。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 中國明史學會、中共文成縣委、文成縣人民政府編：《第十四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 中國明史學會、貴州省文史研究館、安龍縣歷史文化研究會編：《南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g in Post-1949 China

XIE Gu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enter for 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uhan University

Built upon the research by early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an Era (1911–1949),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hip in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or 1683) actually took a tumultuous path to come to this point today, rising from low tide to high tide. The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first,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6; then, from the economic reform began in 1978 to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finally,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1st Century.

Scholarly monographs began to appear and increased in number while academic papers proliferated exponentially. The scope of research ranged from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to diplomacy, military affairs and society, covering many aspects of the Southern Ming polity. Research theories and methods were ever more sophisticated and enlightening. Xie Guozhen (1901–1982), Qian Haiyue (1901–1968), Nan Bingwen (b. 1942), and Gu Cheng (1934–2003) among other experts 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g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period. It should not go unmentioned that a brilliant younger generation took up the baton and continues to be productive. Due to the well-established teaching of the Southern Ming history, a great number of Master’s these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were written on the subject, proving that young scholars can certainly drive this field of research forward.

Keywords: Post-1949 China, the Southern Ming history, literature review,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